

人口科学文集

RENKOU KEXUE WENJI

河南师大人口理论研究室编

河南师范大学科研丛书

1983

毛泽东同志的人口思想是研究 和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翁 琦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正确地解决了旧中国复杂的人口问题，并根据我国经济建设和人口发展的实践提出了“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的增长”，实践证明它是无比正确的。毛泽东同志的人口思想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坚持和捍卫了历史唯物论关于社会革命的发生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原理。

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帝官封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广大劳动人民饥寒交迫，多成了庞大的失业群。到解放前夕，全国城市失业者达到四百多万，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而在业工人所遭受的剥削更加沉重，不仅劳动时间长、强度大、而且工资低，一般都在劳动力价值以下。当时我国一些社会学者由于受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在研究方法和基本观点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将人民生活的穷困全归罪于“人口众多”，似乎与社会制度无关。帝国主义者为了掩盖其侵略本质，扑灭我国人民的革命思想，更是大肆鼓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二次大战后美国政府的国务卿艾奇逊，他在1949年7月13日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胡诌中国革命的发生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没有“足够的东西吃”，“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他还恶毒诬蔑中国共产党也无法“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对此毛泽东同志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发表了《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因素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原理，并着重提出了革命的发生并不是由于人口太多所决定的论断，而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压迫所造成。文中指出：“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读过。华盛顿、杰佛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

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399页）。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还科学地阐明了中国人口问题产生的根源，“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00页）并提出“革命加生产”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毛泽东同志这些光辉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对于当时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掠夺和侵略本质，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教育国内一部分社会学者认清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反动实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指出了“我国人多是好事情当然也有困难”具有两重性的观点

解放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医疗卫生条件、人民生活都有显著的改善。五十年代初，危害人民健康的烈性传染病和流行病，例如，霍乱疟疾、天花已基本被控制住了。因而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据统计，五十年代人口死亡率下降到10—17‰。人口死亡率下降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在同一时期，人口出生率仍保持在高水平上，据统计，五十年代，人口出生率在30—35%之间。人口再生产类型不再是解放前的多生多死，而是多生少死。由于生得多，死得少，人口自然增长数猛增。从1949年到1957年的七、八年间，人口由54000多万增加到64653多万。扣除死亡人数后，平均每年增加1200多万人口。人口增加得这样快，这样多不能不给国家、每个公社、生产大队以至每个家庭带来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1957年毛泽东同志针对我国人口多、增长快这一事实认为人多具有两面性，“人多是好事情，当然也有困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7页）他还说：“我们这个国家的好处就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1949年没有粮食，1956年我们增加1400亿斤粮食可还是不够”，（《人口研究》1981年第4期第14页）。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还具体分析人口增长过多过快给国家在安排就业，安排小孩子上学，解决吃饭交通等一系列问题上带来的困难。他的这些看法，实践通明是很正确的。

三、提出了“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

1957年3月，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经济建设和人口发展的实践，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的增长”。（《红旗》1978年第6期第60—61页）以后在195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指出：“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人类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1页）1974年在关于第四个国民经济的方案中毛泽东同志又亲自加上“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指示。所有这些都教导我们人类在生育领域内，要克服无政府状态。逐步做到然后完全做到有计划地生育，同时还教导我们实行计划生育要大造社会舆论，发动社会力量走群众路线，今天结合我国经济状况和人口状况重温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倍感亲切意义深远。

近几年，特别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同志的人口思想已被广大群众所掌

握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材料表明，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七十年代的26%下降到1981年的14.55%。党的十二大又明确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和必须力争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战略目标。通过全国城乡广泛而深入地进行计划生育的宣传活动。使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已经家喻户晓，日益深入人心，加深了对控制人口增长重大战略意义的认识。

我国计划生育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今后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第一，一部分干部、群众对实行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是根本性战略措施，还没有完全理解，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人口问题对于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极端重要性。因而，我国的多胎生育率还很高。1981年出生的婴儿中，属于三胎和三胎以上占28.09%，（一胎46.55%，二胎为25.36%），有的地方农村中多胎率高达40%。第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着生育高峰期。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和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的推算，1983—1992年的十年，全国每年平均有1200多万青年男女进入婚期，1993年至2000年的八年间，每年有1000—1100万对青年男女进入婚期，这样，在今后十八年内总数将有二亿多对青年男女进入婚育期。每个妇女只生育一个孩子，今后十八年就要出生两亿人。第三，还存在着一些思想和实际问题。如“重男轻女”的旧思想，农村中的“老有所养”问题，提高人口素质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因此，到本世纪末要实现把我国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的目标，还必须做长期的艰苦的努力，一定要坚持不懈地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人口生育政策，同时在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之际，要全面地、科学地认真领会毛泽东同志的人口思想，进一步贯彻计划生育以宣传教育为主，避孕节育为主，经常工作为主的方针，我们计划生育工作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确保我国的人口增长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适应。

略论人口问题

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

沙 献 玉

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有过不少的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论述，是对我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思想。

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邓小平同志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这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底子薄和人口多是互相制约的。其中人口多，即“十亿人口，八亿农民”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极为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五七年就说过，“我们作计划、办事情，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②“十亿人口，八亿农民”是我们规划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时的基本出发点。

邓小平同志对我国的人口状况做了全面的分析。他指出：“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③人口多有好的一方，主要表现在：第一、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可以组织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依靠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合理、有效、充分地利用能够利用的自然资源和物质条件，大力发展各项生产事业和服务事业。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保证；第二，我国人口多，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中的物质资料量就很大，因而有广阔的国内市场，社会经济发展不会因市场狭小而受到限制，使生产和流通得到迅速发展；第三，我国人口多，兵员潜力充足，使我们拥有抵御外部敌人侵略、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力量。“我们有这么多人口，军民团结一致，敌人要消灭我们的人民是不可能的。”④因此，分析我国人口时，看不到人口多有好的一方面，单纯地把人口多看成沉重的包袱，是不正确的。

当然，人口多固然有好的一面，但也有不利的一面。邓小平同志具体地分析了人口多给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困难。他指出：“在生产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都成了严重的困难。”⑤其一，粮食问题。我国目前“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

① 《邓小平文选》第37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7页。

③④⑤ 《邓小平文选》第150页。

有真正过关。”①其二，教育问题。“我们的学生，中小學生多，大学生很少，在校的不过一百万，”而且“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的发展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甚至有些第三世界国家，在这方面比我们重视得多。象埃及这样的国家，人口只有四千万，按人口平均计算，他们在教育方面花的钱，也比我们多几倍。总之，我们非要增加教科文卫的经费不可。”②此外，干部、职工教育也相当落后。其三，就业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么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临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③其四，人口多的问题将长期存在。邓方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我们地大物博，这是我们的优越条件。但有很多资源还没有勘探清楚，没有开采和使用，所以还不是现实的生产资料。土地面积广大，但是耕地很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④

因此，上述我国的人口状况成为现代化经济建设所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要经常记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并依此为出发点来制定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战略和策略，规划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

首先，从我国底子薄、人口多的状况出发，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发展的目标要有明确的服务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劳动人民的幸福，即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确定这一经济发展目标，才能使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起来。这就必须考虑我国人口的现状和特点。只有这样，才能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方向，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同时，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即经济发展的水平，不仅要看物质资料产品的总量，还要看国民收入总量和人均国民收入量。人均国民收入量及其增长速度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人均国民收入取决于国民收入总量和人口总量两个因素。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我国经济和人口状况对国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时指出：“中国这样的底子，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劳动生产率、财政支出、外贸进出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很快。”⑤邓小平同志还特别重视人均国民收入速度。他认为：“我国人口多，如果国民收入按人口平均每人增加一百美元，国民总收入就要增加一千亿美元。人多有人多的麻烦，很多问题不容易解决。”⑥因此，不论经济发展目标所服务的方向还是经济发展目标所达的水平，都与人口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而不能忽视人口状况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

其次，从我国底子薄、人口多的状况出发，确定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党的十二大指出：农业问题、能源、交通问题和教育、科学问题是我国到本世末的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以农业为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的改善，决定着工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以及国家的安定。农业发展了，“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⑦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和亿万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的发挥，我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

①②③④ 《邓小平文选》第89页，214页，150页，150页。

⑤⑥⑦ 《邓小平文选》第233页，360页，87页。

的变化。但是，目前我国农业的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农业所提供商品粮和原料还不能满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还没有真正过关。耕地少与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的矛盾相当突出。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说：“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①从而，使我国的农业迅速发展起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可靠的基础。

再以教育和科学为例。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谈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从我国底子薄、人口多的状况出发，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为科学和教育积累更多的资金，把它们的发展建立在雄厚的物质基础上；采取多种形式和途径办学，不断调整教育结构，加强高等教育、发展中等教育，切实搞好普及教育和职业教育；加强党的领导，不断改革教育和科学管理体制。可以预期，只要按照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发展方向去做，我国的教育科学事业就一定能蓬勃地发展起来。

再次，从我国底子薄、人口多的状况出发，建立适合我国情况的技术结构。由于我国资金有限、技术不高、人口又多，这就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技术结构。过去把企业的技术改造或建立新企业，误解为都要采取最先进的技术是不对的。在我国现阶段，在所有生产部门或企业都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不论从资金还是劳动者的数量和技术素质看都是有困难的。因此，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既要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着眼，又要从我国底子薄人口多的实际出发，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工农业生产的技术结构，将是自动化、机械化、半机械化以至手工劳动并存的多层的结构。也就是说，对发展国民经济和加强国防有重大意义的关键性企业，应当采取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工艺；对大多数企业则应采取适合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的，又能带来最佳经济效益的先进技术，还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将继续实行手工操作，以便创造条件把我国的生产技术水平逐步引导到现代化的水平上来。

最后，从我国底子薄、人口多的状况出发，建立适合我国情的就业结构。任何社会的生产，都必须具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两个方面的因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为劳动者就业开辟了越来越广阔的途径。但是，要实现劳动者的充分就业，就必须使劳动者的数量和素质同社会拥有的生产资料量相适应，即必须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从而进行有效的劳动，促进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水平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会成比例的变化。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的技术构成会不断提高，因而物质资料生产领域对劳动者的需求有相对减少，甚至还会有绝对减少的趋势。就我国来看，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固然可以为劳动者就业提供更广的门路，使劳动者走向各种工作岗位。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多，劳动者人数也多，特别是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口，因而劳动者就业问题，即劳动力资源的供给和劳动力需要量之间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要在大力控制人口的前提下，调整经济结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等，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技术政策、就业政策和分配政策，使劳动者的就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之间相适应。

^①《邓小平文选》第321页。

我国古代人口思想光辉成就六则

张玉祥 赵治法

人们大都知道我国古代有着光辉的哲学成就，并常以此为自豪。可是，对我国古代人口思想的光辉成就知道者恐怕不多。为继承发扬我国古代人口思想，为使我国古代人口思想列入世界古代人口思想之林，为使“言必称希腊”者戒，特此从世界范围考察，辑来几朵鲜花，看我国古代人口思想的光辉成就。

一、我国是建立人口统计最早的国家之一

远在西周时期（即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七七一年）为了加强人口管理，了解人口数量及其变动情况，从中央到地方设有专门统计人口的官员，中央管理人口的官员叫司民，各州的叫州史，州史以下闾师和各族的宰。凡孩子出生三个月，宰把他们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报闾师，闾师报州史，再报司民。且在周宣王（公元前八二七年）时，为补充兵源，增加财赋，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也是我国最早的人口普查。这就是《国语·周语上》记载的“宣王既丧南国师，乃料民于太原。”这次调查比雅典年对服兵役的青年进行登记的人口调查要早五百年。也许人们会说，远在公元前三八〇〇年巴比仑王为征兵征税举行过户口调查，古埃及在公元前三〇五〇年为准备筹建金字塔也举行过户口调查吗？不错，这是事实，比我国早。但这一些调查不论规模，还是调查项目，远不如我国西周时期的举国上下有目的、有组织、有专门官职负责的全面人口普查。

如果说西周时期的人口普查还不典型，那末，明初（即公元三七〇年的“户帖”）应该说具有现代化水平的人口普查了。因为这次人口普查的内容计有户的种类、籍贯，家庭成员姓名、年龄及户主关系，各户全部动产和不动产等项，远较十八世纪（即一七九〇年）在美国和十九世纪初（即一八〇一年）在美国所举办的国情普查详细得多。难怪当今西方统计学者也一致承认这是世界上最早试行人口普查的先例。（见《文摘报》八三年十二月）

至以我国历代的“类书”、“史书”、“会要”等均有详细人口统计，其丰富程度在当时世界上亦属首屈一指的。

二、商鞅的人口与土地数量必须保持平衡的思想

商鞅（约公元前三九〇年——三三八年）卫国人，号商君。他不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法家的代表人物，而且他的人口思想也极其精辟。他继承和发展了墨子的

“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所不足也”（《墨子·非政中》）“地得其任则功成，地不得其任劳而无功”（《墨子·号令》）的人口与土地数量必须保持平衡的观点，提出了二者平衡的具体标准。他在《商君书·算地》中指出：“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因而强调“民胜其地，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徠。”两者之间必须保持平衡。否则，“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同。”“地大而不足者，与无地同。”商鞅不但提出二者平衡之标准，而且指出，当出现不平衡时解决的办法。这就是“制土分民之律。”并在《商君书·徠民》中谈到二者比例，“地方百里者，山陵什一，薮泽处之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溪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其山陵、薮泽、溪谷可以给其材，都邑、溪道足以处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由上可知，商鞅对人口与土地数量平衡之见解是十分精辟的。在公元前四世纪就有此见解，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这比他晚几十年古希腊柏拉图（公元前四二七年——三四七年）的土地必是以扶养一定人数的居民并能使他们过最低的生活，但也不必过多。……”（《法律论》转引自南亮二郎：《人口思想史》苏正绪译）这个见解显然有着天壤之别，可以说，柏拉图这个见解，还不如我国墨子（公元前四六八年——三七六年）的见解高明。

三、《管子》的“人满”说

《管子》一书是先秦时期由崇拜管仲、托名管仲编写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里，有着十分丰富的人口思想。如“国民定居”、“扩大就业”、“合理安排城乡人口比例”、“提高人口质量”、“加强人口统计”等等。更值得称道的是，在这部著作《管子·霸言》篇中写道：“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曰人满。”意思就是说，土地多而不耕地，等于无地，人多地少，则不能使人各安其业，会出现人满之患，造成社会不安。在《管子·八观》篇中还认为“凡田野，万家之众，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足矣。即是说，养活一万户人家，需要有方圆五十里的耕地。由此可见，《管子》是继承了商鞅的人口与土地平衡的思想，虽说没有大的发展，但明确提出了“人满”的思想，且一直成为旧中国作为“人口过剩”的代词。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见解啊！当然，这个“人满”并非指现代资本主义由于“生产力压迫人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618页——619页）而引出的人口过剩规律。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相对人口过剩并非资本主义所特有，因此，在古代由于“人口压迫生产力”而引起的人口过剩。这个思想正是由于我国《管子》首先提出来的，而不是古希腊、罗马的色诺芬、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首先提出来的，更不是西欧中世纪意大利思想家马基威利、英国封建社会后期托马斯·莫尔、法国的琼·波丁等提出。这对那“言必称希腊”的人将是不易理解的。

对于这个“人满”问题，到北宋的李觏（公元一〇〇九——一〇五九年）更加明确指出，当时社会上大量的“逐末”之民和“冗食”之民乃是“过剩人口”，并深刻指出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土地兼并的结果。真是切中时弊，入木三分。这比十八世纪才出现的马尔萨斯把人口过剩说成是自然规律并据此而反对社会改革的反动谬论岂能相提并论。

四、公元前二世纪古今中外最高人口观点——徐干的《中论·民数篇》

徐干（公元一七〇——二一七年）字伟长，著《中论》二十篇。辟有专章论述掌握全国人口数字是国家根本的任务。他在《中论·民数篇》中指出：“故民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者，其唯审民数乎。”这就是说，一个封建国家的任何政务安排，都必须以人口数量为基础，都必须掌握人口数量以后，才能提出办法，甚至连上层建筑中的法律和道德规范等，也应了解“民数”结合起来考虑。这可以说是公元二世纪之前，古今中外历史上把人口问题的重要性提得最高的人口观点。因为古希腊柏拉图的保持一国人口数量稳定的提法，只包括雅典五千零四十家公民而已，把数十万奴隶即被排除在全国人口数量之外。这和我国先秦的人口相比，应该说是十分片面的，至于欧洲中世纪那黑暗时代更谈不到值得称道的人口思想，可以说，直到十六——十七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才出现了类似我国战国时代的“众民”思想的普遍追求人口增长的思想，及至十八世纪臭名远扬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也只以人满之患为恫吓，藉以反对社会改革，根本未涉及人口数量是一国内一切规划的基础这个要义。

徐干，不仅提出了这个可贵的原则，更是距今一千七百多年就能把人口问题作为专章来进行研究，这在中国可是第一个，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五、徐光启的“生人之率”

徐光启（公元一五六二——一六三三年）字子先，号玄扈，上海徐家汇人。是我国明代杰出的科学家。译有《几何原理》、《测量法义》、《勾股义》，编有《崇祯历书》，著有《徐氏庖言》、《农政全书》、《农遗杂疏》等等。这些著作中，尤其《农政全书》，迄今仍是我国科学文化史上的宝贵遗产。

徐光启不但在科学上有巨大的成就，而且在人口思想上也有很大的贡献。他针对当时“南人众北之人寡，南之土狭，北之土芜”的情况，继承了叶适，王符、崔寔等人的均民思想，提出了“徙远方之民，以实广虚”（《徐光启集·垦田第一》）的重要主张。尤其可贵的是世界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了人口每三十年增加一倍的观点。他说：“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内加一倍。自有大兵革，则不得减。（《农政全书·田制·玄扈先生井田考》）尽管这个理论是他从考察明朝皇族子孙蕃衍的情况推论到一般平民百姓的人口发展情况，因而缺乏足够的科学根据，但也决非出自臆造。

徐光启的“生人之率”说为后来的马尔萨斯在《人口理论》中那种推算出来的二十五年增加一倍的论点相似，但比马尔萨斯早了一百七十多年。再就我国清代洪亮吉的人口思想相比，尽管与马尔萨斯的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许多本质的差别），也比马尔萨斯人口论第一版问世早了五年。

六、关于优生问题

今年是优生学创立一百周年的纪念日。

一百年前，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在《物种起源》的影响下，发现人类不仅上下代貌相酷肖，而且很多疾病（如精神病、血发病、色盲等）同遗传有关。于是他认为也应象物种进化那样选优去劣。一八六五年他发表了《遗传能力及性格》的论文，提出选择佳偶，淘汰劣种，繁殖优秀，以改良人种的学说。一八八三年正式起用了优生学这一科学术语，故其贡献是无可非语的。

然而，人们可曾知道，我国在古代虽未提出这个科学术语，可是优生思想早在公元前《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即公元前六三三年就有“同姓不婚，其生不蕃”的忌讳，这句话就是从排斥血族所婚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因血族婚对后代的不良影响有一定的范围。所以又有“六世亲属绝矣”的说法是完全符合科学道理的。

又，郑国子产（公元前？——前五二二年）说过：“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足以恶之。”

再据《后汉书》记载，我国古代还懂得改良人种的道理，并在改良人种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由上可见，我国古代优生思想是很有见地的。可以说对如何提高人口质量，上起勾践、孔孟，中经汉晋唐宋，直至明清两代，都是十分重视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在外国在希腊罗马的著名思想家亚里斯多德（公元前三八四——三三二年）在其《政治论》中也曾提出过人口质量问题，并谈到选择结婚对象，妇女生育年龄、妇女怀孕后应注意的问题等等。然而，他们的这些思想却是在我国僖公之后的二百多年啊！

上述六则，仅系我国古代人口思想可能与外国人口思想可作对比分析的部分。这并非是有尽有、无所遗漏。甚至是挂一漏万的。但仅此足以说明我国古代人口思想的光辉成就，应引以为自豪。当然我们不能迷恋祖国古代的光辉历史陈迹，而应相反，要牢记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中国应当对世界作出较大的贡献！”让我们继承和发展我国古代光辉的人口思想，攀登人口科学高峰。

马乘风所著《中国经济史》

一书中的人口思想

解 学 东

马乘风原名马鸿昌，1906年出生于河南省宜阳县上石村。他青年时代曾求学于开封第一师范，在校学习比较努力。离校以后又能长期坚持刻苦自学，在自学中他曾主动地求教于嵇文甫等老师的指导和帮助，钻研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问题，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在1935年初写出了《中国经济史》两册约六十万字左右的著作。此书当时曾作为国民党统治区大学丛书，一、二两册分别于1935年和1936年由中国经济研究会和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有些大学也曾作为教材使用。

马乘风所著《中国经济史》著作的基本内容，主要是说明先秦和两汉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的。此书的内容阐述上，一方面能吸取当时社会史论战的一些积极成果，“知道拿出生产方法（应为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笔者注）作为划分社会阶段的利刃”^①，初步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说明问题；但另一方面仍有浓厚的唯心史观渗透其书中，故此著作的错误之处比较明显，对社会的不良影响也较突出。但综观其全书，作为我国三十年代的产物，它的确是较早的《中国经济史》论著之一，而为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和写作提供了一定的资料和借鉴。另外，此书尤为可贵之处，是把社会人口问题引入了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注意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应是一个突出的创见。并又在谈论人口问题时，能围绕人口与经济这个重大问题，对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人口的分布、人口的构成等问题，都均作了一些说明。因此，本文就此书中所谈论的有关人口问题，加以整理和说明还是相当必要的。下面就简要的对此书中所论及的几点有关人口问题，进行一些说明。

第一，在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上，尽管马乘风当时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以客观主义态度来评判历史上的人口问题，以及他当时严重的存在着“耕读传家”、“学而优则仕”的向上爬的思想。但他毕竟在此书中较明确地提出了人口的数量和质量的问题，并且积极主张在增长人口数量的同时也必须提高人口的质量问题。

首先，关于人口数量问题，此书非常强调历代的人口奖励政策。如第二册第333页曾讲：“秦之时，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之令，汉时也有此种情形，女子在结婚年

① 嵇文甫为马乘风：《中国经济史》所写的序文。见此书第一册第3页。以下引文凡涉及到马乘风：《中国经济史》一书时，均简写为“此书”。

龄不结婚者，加倍征税；家中人口健全，普通能活七、八十岁以上者，则免其全家之若干部分人头税。对于官吏之惩赏，亦以在任时之人口消长为其评判条件之一。”另外，“法律对于无故致婴儿於死亡之父母，要处以相当的刑罚，”等等。特别是此书在第一册第242页中讲战国的经济时，曾提到当时由于频繁的兼并战争规模也大，“胜败两方之评判，常以地大人众粟多为断，欲求地大粟多又非人众不可，所以那个时代的国君是常以寡人之民不加多为忧的。”既然都希望人多，那么如何增加人口的数量呢？“这当然要招徕外来的移民和奖励国内的生殖，这两类政策在战国时代的国君，都是争着干的。”对于奖励国内人口生殖的措施问题，上面所讲的在战国时期诸侯国在奖励人口增殖上都曾采用的。对于招徕的外国人到本国移住问题，书中又指出了“必须其待遇条件较之外国人在其原来的住地者为优，然后他们才肯来。”就以秦国为例，引证《文献通考》中一段话“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稠，诱三晋之人耕秦地，优其田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大率百人则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而加以说明。最后，又解释了“优其田宅”恐怕就是私有其田宅，至少有一部分是私有的。”之后，就明确指出：秦国就用这样的人口政策，“积久而渐，把以前的社会状态慢慢的破坏了”，使秦国的封建经济迅速发展，结果能统一六国。

再者，关于人口质量问题，此书也比较重视。如第二册第328页谈汉代经济时，作者却大大抒发了其“耕读传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尽管大加散发这种思想是不对的，但总说明了在人口质量上要人们学知识、学文化、学技术还是必要的。另外，此书也揭露了一些“达官贵族”的有闲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庸庸碌碌”的混日子情况。但是，此书大谈提高人口质量问题，还是在第一册第243页，接上面讲战国时期人口数量增多之后，紧接着又提到了人口“质量上之增多”。而这里讲人口质量的增多，主要是指“把一个人的工作效力提高到几倍，这样无形之中，人口增加几倍了”。怎样地来提高人们的工作效力呢？“首要的条件是提高其工作兴趣”，而又怎样地来提高其工作者的兴趣呢？”又必须使工作者直接对其所操持之工作感到其切身利益，到究底，还是要以一部分的利益为他们所享用才行”。在这里此书又以秦国为例，曾引《史记·商君列传》一段话加以说明。讲：“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孥”。从而解释“僇力本业”“就是提高其工作效力之意。所以想使耕作者‘僇力本业’就必须使‘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即免除其不自由的身分，使劳动者直接得到利益的鼓励”。只有如此，秦国的劳动者不仅数量能大大增多，而且质量也大大增加，这就是秦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另一个原因。

综上所述，此书谈人口数量和质量，当然全是就古代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而谈论的，并且在谈论中也夹杂进了一些不健康东西。但是就人口数量与质量必须统一而论，特别是在人口数量的发展中，（包括增多和减少），必须注意人口质量的提高，以及在人口质量的提高中，学习科学文化和技术，注意提高工作效力等，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了很快地进行现代化建设，我们必须在认真控制人口发展的同时，又必须重视人口质量的提高，大力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尊重人才的培养。

第二，在我国古代人口的分布问题上，此书为了说明我国古代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性，也曾进行了较为详细地说明。尽管该书论述中还未看到中原河南人多的严重性，但总是比较明确地说明了先秦和两汉时期黄河两岸中原一带的人口已相当稠密了。比如在前面谈人口数量和质量时，已讲过先秦时期“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稠”，故秦国为了“耕战”和“富国强兵”，就去诱惑三晋韩、赵、魏之大量人口来到秦国，而从事耕种。就当时的齐、楚、燕三国情况撇开不说，就足以看出先秦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人口和其他地区相比已经是很稠密了。这也说明当时各诸侯国的人口分布状况是不平衡的，故其经济发展不等，国力强弱不同。这种人口分布不均衡的状况，发展到两汉时期又该是如何的呢？此书第二册第二编第四章又专列了一节来进行说明。它首先概述了全国人口“河南、山东、河北三省为全汉代人口最稠密的地方，而尤以三省之交连部分为最甚，当时称之为豫州，冀州、青州、兖州”。而其余各地除陕西“因为是首都所在地”，人口“较为稠密”外，其他各地均“地广民稀”^①。接着为了进一步详细说明汉代人口分布状况，则大量抄录《前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列表作了对比，最后则又指出：“由上表所示，可知当时人口多集中于山东、河南、河北、陕西中部诸地”。特别指出了当时的“豫州约占全国面积五十分之一，而人口则占百分之十三以上。具豫州全部仅及豫章一郡（今江西省）面积之一半，而豫州有县一百零八，人口七百五十余万，豫章郡则仅有十八县，三十五万人而已”。随后，又简要说明后汉时期的人口分布，较之前汉“稍有变动，大概北部减少，尤以西北及东北为最甚，南部则稍有增加，然山东西部，河南东部及河北南部仍为人口稠密之处”。其他北部各地除南阳为帝乡“而显著之增加外，余均减少”。南方各地均有增加，“惟长江流域，则见增加，尤以江西、湖南二省为甚”^②。这样的人口分布不均衡状况，当然也说明了古代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即中原人口稠密，所以经济较发展；又因经济发展，而人口就稠密。但边远地区则土地荒凉，所以人口稀少，而人口稀少，故经济总是落后。

以上这种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状态应如何改变呢？也就是说应如何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呢？此书第二册第二编第四章又列了几节来谈当时如何解决这种状况的一些措施。但最为主要的措施，一是人口的移植政策。“即是把罪人及贫民流徙置于边郡诸地，这为的是繁殖边郡，以备民族之侵袭”。这也就是晁错最早提出的“所谓屯田”，但自晁错之后，汉代“诸帝已多用此法”，在边境进行移民屯田。^③二是限制兼并土地和一些“均产运动”。这就是说中原几省土质“最佳”，但“土地兼并巨烈”，若不限制土地兼并，则中原人口之大部生活问题则无法解决，结果要影响封建社会统治秩序，故需要加以限制。具体“限田”问题自董仲舒提出，师丹着手实施，因达官贵人大地主反对，但成效不大而告终。就是最后王莽比较坚决的土地措施也是归于失败。到后来东汉崔实和荀悦的“限田”和“耕而勿有”方案，也仅是说说而已，根本无法实施^④。

总之，通过上面所讲足以说明了我国古代先秦和两汉时期，我省和河北等中原地带的人口已相当稠密了。就我省而论，假如两汉时豫州（今河南省之大部分地区）七百五

① 以上所引均见此书第二册，第337—338页。

② 以上所引均见此书第二册，第350—351页。

③ 以上引文参阅此书第二册第334页。

④ 以上内容参阅此书第二册第353—358页。

十万人就比较稠密了，也就是说已经是人众地狭了。那末发展到今天我省已是七千余万人时，就已超过了两汉时人口之十倍以上。当然，就今天生产力的发展来看，土地的产量要比两汉时大为增多了好些倍。另外，河南人多，对农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却有充足的人力资源。但无论如何毕竟会因为我省的土地有限，和现有的工农业生产基础不高，而我们河南省的人多问题，总是当前一个极为突出的严重问题。因此，联系古代来认识现在，就会促使我们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应在认真坚决贯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人口自然生殖的同时，还必须要有计划的分期分批地向边疆兄弟省移动一些人口也是必要的。只有这样双管齐下，不仅能够妥善解决好我省的人口问题，有利于我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同时也能为支援边疆兄弟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多贡献些力量。

第三，在人口的一些构成上，此书作者尽管无意地进行说明，而且就说明有些人口构成时又夹杂一些不健康的因素，来发泄自己的狂热情感。但毕竟在书中为了说明有关经济问题，而涉及了一些人口的职业、性别、年龄，甚至阶级等构成。因此，此书关于人口构成的一些看法，也应该加以简要说明。

首先，在人口的职业构成上，主要表现为全书二册基本是按农、工、商三业来说明古代各个时期经济状况的。如第一册开始谈西周的经济时，曾引证《史记·平准书》讲：“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①。又如第一册第二编谈《春秋时期农业及商工业之比重》时，曾大量引证《左传》所讲的材料，来说明“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商工皂隶，不知迁业”，“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等等^②。再如第二册第二编谈《汉代纯经济过程之横剖》时，把汉代的农、工、商三业就具体分作三章详细的加以分析和说明。再者，在农工商三业内部各自的人口构成上，又有各自的一些具体分工和构成，如农业内部有“农夫”、“农妇”、“耕战”、“耕织”、“男耕”、“女织”、“女桑”等之不同的人口；商工业内部则有“官家商工业”和“民间商工业”，“百工”和“末作”，以及各种手工制造者的木匠、陶工等职业人口。此外，除以上农工商三业人口外，书中也提到了社会上其他职业人口构成，如“兵士”、“士人”、“医生”，以及“高利贷者”等等。总之，此书还是注意了一些人口职业构成的。

其次，在人口的性别构成上，此书也有所注意，象上面提到的“农夫”、“农妇”、“男耕”、“女织”、“女桑”等，既说明了人口的职业构成，也说明了人口的性别构成。但应该指出，此书在谈男女性别构成上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即比较重视女性和同情女性。如第一册第281页在说明齐国的经济状况和商业的发展时，曾引证了《史记·苏秦列传》讲：“临菑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随后接着就评论说：“苏秦是站在军事的观点上，只举男子，而未把女子统计在内，恐怕女子也要占半数吧，这就有四十万大众了，……”。这就是此书重视女性的一例。另外，此书在重视和同情女性的事例太多了，特别全书曾用了大量文字来揭露封建统治者骄奢淫佚生活，比如讲汉室皇帝自武帝

① 此书第一册第34页。

② 此书第一册第97—98页。

之后都有“三宫六院”、“宫女数千”，而皇亲贵族，达官富人则一般是妻妾成群，“童女百千”。随后接着就痛斥这些统治者“霸占女性、侮辱女性”的结果，就必然使这些女性在统治者独占之下，“把人生应享的快乐牺牲了，这真是女性的最大的侮辱者！”另外，此书也多处讲出了许多统治者玩弄女性淫秽之语。这当然充分表现了作者的资产阶级人性论性解放的浓厚思想，但从这些大量的文字揭露中，毕竟反映出此书作者对广大女性的重视和同情，特别是此书作者能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大张旗鼓地为受苦受压迫的女子说话，是应该给以肯定的。

再次，在人口的年龄构成上，此书也曾作了一些说明，比如前面曾谈汉代“能活至七、八十岁以上者，则免其全家之若干部分的人头税”，“对于无故致婴儿于死亡之父母，要处以相当的刑罚”等，也就说明了人口的老少年龄的构成。但此书比较具体的谈人口年龄情况的应是在第二册第448页谈《汉代赋税制度》时，曾指出汉代“人头税（即人口税），可分为三种：第一，是成丁的人口税（即15至56岁的男子的人口税——笔者注）；第二，是未成丁的人口税（即7——14岁的男性小孩的人口税，——笔者注）；第三，是力役变象的人口税，即更赋是也”。特别是这个更赋，汉代人民达到什么年龄出更赋，截止什么年龄解除更赋的问题，书中引证了《汉书》和《盐铁论》等古书后讲：民“力役之征，二十三始赋，五十六而免”。总之，此书已注意到一些人口的不同年龄问题。

最后，在人口的构成上也需要提及的，是此书在分析说明经济问题时，也曾提到了古代各时期的一些阶级状况和构成，如谈先秦经济时已提到西周时人们已分为“坐食阶级与劳动阶级间之愤愤不平的对立”，这些对立就是古书中所说的“大君”、“大人”、“天子”、“诸侯”、“太史”、“司徒”、“大夫”，以及“小人”、“庶人”、“群黎”、“下民”、“临民”、“牧人”等等，“染着阶级色彩的字样”也就是“贵族和农奴两大集团”^①。再如讲春秋时代，说“当时的生产关系，分作两个对立的阶级：站在榨取的阶级线上的，是那般美其名曰：‘勤礼’，曰：‘养神’，曰：‘劳心’的掌握着土地的支配权的诸侯，卿大夫，士；站在被榨取的阶级线上的是，那般‘劳力’的‘力于农穡’的为土地所束缚的‘庶人’，‘小人’。”这样就清清楚楚地看出，“前者是贵族阶级，后者是农奴阶级，前者的穷奢极欲的生活，完全是后者血汗的榨取”。因此书又联系批判孟轲所讲的“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说教，而尖锐的指出了“野人没有君子治，倒还舒祗；祗是君子没有野人养，那可真要活活饿死了”^②。至于以下战国和两汉所谈的阶级构成就更详细多了，我们在这里就不必一一述说了。

总之，从上面所谈可知，此书能对古代一些人口构成有所注意，特别是能提及到阶级构成，而能痛恨统治者，同情劳动者的思想，是应该给予认真肯定的。就其谈到的其他人口构成来说，尽管有其不健康和不完整的地方，但对于我们当前的人口问题的研究，以及涉及人口问题的一些具体工作上，都还是能起到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的。因此，此书的人口构成思想我们也必须给予应有的重视。

①以上引文参阅此书第一册第40——42页。

②以上引文见此书第一册第93页。

洛阳地区历史上的人口数量和分布

孙 应 谦

洛阳地区位于河南省西部，地理位置 约在北纬 $33^{\circ}33'$ 至 $35^{\circ}05'$ 、东经 $110^{\circ}22'$ 至 $113^{\circ}06'$ 之间。东接嵩山山地，与开封、许昌两地区相邻；南至伏牛山岭，与南阳地区毗连；西至省界，与陕西接壤；北界黄河，与新乡地区隔河相望。总面积二万六千多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15.7%。

洛阳地区现在共辖县、市十三个，即渑池、陕县、灵宝、宜阳、伊川、汝阳、临汝、嵩县、洛宁、卢氏、栾川、三门峡市、义马市。为便于分析、研究豫西地区历史上的人口发展，这里把去年划归洛阳市的孟津、偃师、新安三县也一并放入洛阳地区。

古代洛阳地区的人口数目缺乏系统的文字记载。但根据考古资料推测，这里曾是人类繁衍、生息、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从已经发现的动植物化石如古象牙、鸵鸟蛋、水龟、树木以及以后发现的原始人使用的工具等，可以推测在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洛阳一带气候温和，降水充沛。山地和丘陵地区森林茂密，植被复盖度大，水土流失不显著，河水较为清澈。并有一定数量的沼泽、湖泊分布，渑池一带更为突出。大部地区不但有丰富的植物资源，而且还有较多的野生动物资源。由于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古代人类的生产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

根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遍布全地区尤其伊、洛河谷阶地上。例如著名的仰韶文化，就是在渑池的仰韶村发现的。同时期的还有洛阳的王湾、陕县的庙底沟以及三门峡、灵宝等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有些地方，这些遗址分布相当广泛，如洛宁县城东西三十里以内的地区中就有十三处。因此可以说，远在五、六千年前，现今洛阳地区的人类活动已经相当广泛。